

Edited by JOHN McMANNERS

牛津基督教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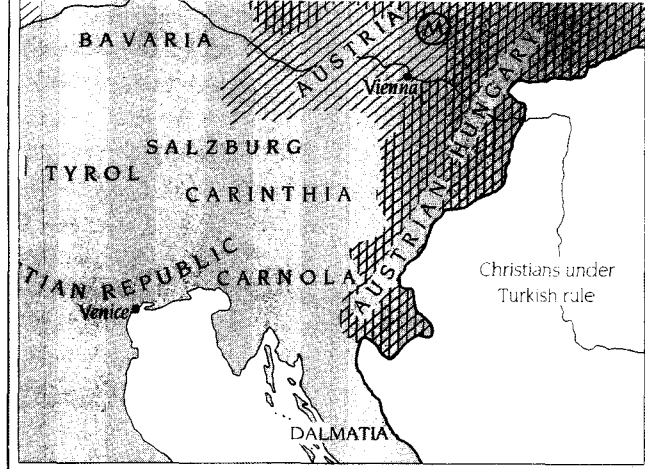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插图本)

约翰·麦克曼勒斯 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933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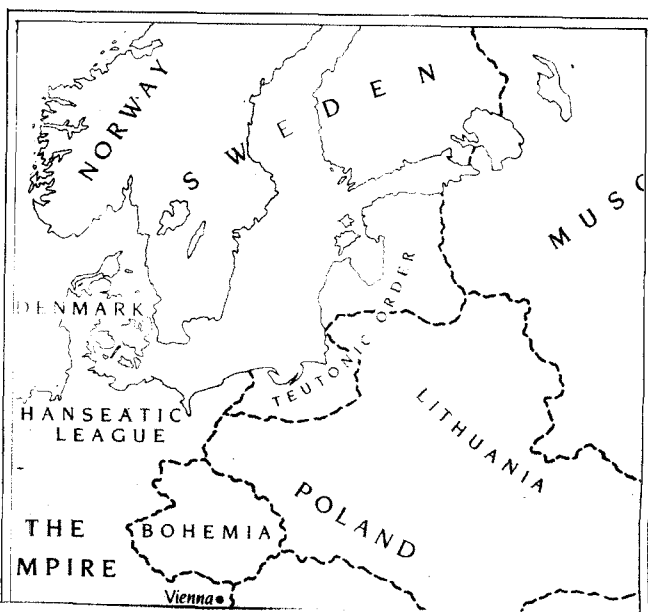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牛津 基督教史

(插图本)

(英)约翰·麦克曼勒斯 主 编
张景龙 沙 辰 陈祖洲 孙 庆 译
李秀领 阚保平 洪邨生 潘兴明
程亦赤 袁 鹰 校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 程亦赤
封面设计 黄 翔

牛津基督教史

(插图本)

(英)约翰·麦克曼勒斯	主编
张景龙 沙 辰 陈祖洲 孙 庆	译
李秀领 阚保平 洪邮生 潘兴明	
程亦赤 袁 鹰	校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贵州协合印务公司 激光照排
精美快速印装有限公司 印 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44.6 印张 908 千字
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7-221-03755-8/K·293

定价: 16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版经牛津大学出版社正式授权,由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牛津基督教史(插图本)

作者简况

约翰·麦克曼勒斯 牛津大学钦定教会史讲座荣誉教授,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研究员。发表过多篇关于法国史和欧洲史的论文。其第五部专著《死亡与启蒙运动》(Death and the Enlightenment)(牛津大学出版社,1981)获沃尔夫逊文学奖(历史类),并于出版当年被《时代》周刊评为十大非小说类杰出著作之一。

亨利·查德韦克 剑桥大学彼得豪斯学院院长,钦定神学讲座荣誉教授。

罗伯特·马库斯 诺丁汉大学中世纪史荣誉教授。

亨利·马里·哈廷 牛津大学圣彼得学院历史学研究员,导师。

凯里斯托司·韦尔 戴沃克利亚的主教,牛津大学佩姆布洛克学院研究员,东正教专题高级讲师。

杰里米·约翰斯 牛津大学伊斯兰教考古学讲师。

科林·莫里斯 南安普敦大学中世纪史教授。

帕特里克·柯林森 剑桥大学钦定现代史讲座教授。

欧文·查德威克 剑桥大学钦定现代史讲座荣誉教授。

马丁·马蒂 芝加哥大学 F.M. 科恩杰出服务荣誉教授。

弗雷德里克·派克 印第安那州罗特达姆大学历史学荣誉教授。

彼得·欣奇利夫 牛津大学巴利奥学院研究员。

肯尼思·鲍尔哈切特 伦敦大学南亚史荣誉教授。

海伦·鲍尔哈切特 日本庆应大学副教授。

塞盖·哈克尔 前苏塞克斯大学俄国研究会高级讲师,不列颠群岛俄罗斯正教会代理主教。

莫里斯·怀尔士 牛津大学钦定神学讲座教授。

布赖恩·威尔逊 牛津大学及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社会学高级教师。

巴兹尔·米切尔 牛津大学奥雷尔学院基督教哲学荣誉教授。

J. V. 泰勒 前英国宣教会总干事,温切斯特主教。

《牛津基督教史(插图本)》中译本序



《牛津基督教史(插图本)》(下称《牛津基督教史》)系牛津大学出版社近年出版的历史系列丛书之一,是一部详实深入反映基督教历史的学术专著。贵州人民出版社慧眼独识,组织翻译出版这部著作,翻译者和责任编辑嘱我作序。我想,《牛津基督教史》的翻译出版,对我国宗教界和有关的学术界都是一件值得庆幸和重视的事。所以赏读之余,欣然命笔。

《牛津基督教史》一书,对基督教产生、发展和传播的主要脉络取总体把握的方法。基督教诞生之后很快就突破了地域和文化藩篱。随着基督教思想对人类文明影响的加深以及宗教统治的强化,它逐渐成为西方世界居统治地位的精神思想力量,影响遍及全球,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的重要宗教之一。基督教思想一度成为世俗社会政治文化权力的最有力支柱。时至今日,它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生活的许多方面,并且是相当一部分人精神世界不可剥离的组成部分。全书在对基督教漫长的历史演变的描述之中,凸现出基督教宗教统治、宗教改革、宗教分裂、宗教战争,以及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相互影响,同时还记述了纷繁复杂的宗教组织、宗教派别、宗教事件和宗教人物。因此,《牛津基督教史》就如同一幅由许多折页组成的浩繁长卷。

《牛津基督教史》在内容分布上大体精当合理。导论部分高屋建瓴,俯瞰基督教近两千年历史,并尤为深刻地剖析了宗教灵感和艺术灵感之间的关系,为基督教的产生和发展寻找到了扎实的文化渊源和基因。全书的主体部分,一方面把中世纪西欧和东方基督教世界、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基督教改革、启蒙和扩张的章节用简练的编年史体例串联起来,另一方面平面地展开英国、欧洲、南北美洲、非洲、印度和远东基督教,包括东正教的历史画面,纵观横览,体现了基督教发展的连贯性、阶段性和区域性,以及诸种因素和各自特色的交互作用和有机结合。因此,当全书在结尾处审视和展望“基督教的今天和明天”时,我们将不会对基督教和基督徒的任何新变化和新形态感到惊讶,因为《牛津基督教史》一书通篇都在说明基督教自诞生以来始终是发展变化的。

《牛津基督教史》一书独具特色。首先,它并不沿袭那种绝对连贯、一般编年史式的写作方式,因而也就克服了罗列史实、泛泛而谈的现象。全书删繁就简,凝练精当,脉络清晰,特色鲜明,既无经院学者的繁琐庞杂,又显得充实丰满。其次,该书反映了一个变化的世界,其中的重点是基督教徒的自我发现和完善。因为注重了人,就比较辩证地反映了神性和人性的关系,突出了“人一教徒”的精神世界,这样就拂去了论述宗教时常有的迷雾,显得富有活力而且变化万端。再

次，全书由十多位具有专门知识的学者撰写而成，他们大都是英美著名大学中长期从事宗教研究的教授、专家，未必都是信徒或教职人员，所以下笔时就显得更从容、更客观、更现实。他们的独特见解和精辟论述，为本书增色许多。他们旁证博引，广罗素材，全书所用材料之丰富、之独特，是目前我国已出版的基督教书籍所无法比拟的。因此，完全可以肯定，《牛津基督教史》中译本的出版，将成为我国研究基督教的首选学术参考书之一。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编者也注意到了使该书“面向一般读者”，因此，全书在充分展现其权威性、全面性、深刻性的同时，不失可读性的特色，从而避免了专题宗教著作或高深学术专著的艰深晦涩、枯燥乏味。全书行文流畅，条理分明，通俗易懂，学术研究的深化和读者面的拓宽得到了有机结合。

对复杂的事物，有人习惯于给予简单化的处理，对宗教和基督教所呈现的无穷形式和内涵，认为引用权威著作中的片言只字就可穷其究竟。这本《牛津基督教史》的出版，希能多少纠正这种阻挠深入研究和理解的惰性。

《牛津基督教史》的翻译者是一些从事宗教思想和世界历史研究的中青年学者，他们以自己学术研究的体会和较为出色的英语能力，理解并比较忠实地反映了原著的思想和内容。他们在翻译工作中作风扎实，态度严谨，为我们提供了这部优秀专著的良好中译本。我想，这不仅将会推动我们社会科学宗教事业学术研究的开展，而且对于提高我国基督教信众和教职人员的素质也是有所裨益的。

1995年元月

译者序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劳德·阿克顿 (Lord Acton, 1834—1902) 说过: “宗教是历史的钥匙”。的确, 宗教信仰与人类文明几乎是相伴而来的。从表面看, 它似乎并不涉及人的现实世界和物质创造, 但在更为深刻的意义上, 它却成为人类迈向更高、更完善理想的精神引领者。如果从这一角度去考察基督教的历史, 那么它为欧洲文明乃至世界文明所作出的贡献, 的确是令人敬叹的。更重要的是, 对于每一个现代人来说, 基督教这把“历史的钥匙”不仅可以开启过去时代中弥漫着神秘氤氲的宗教王国之门, 而且只要现世与宗教天堂之间的差别依然存在, 它就将不断地激励人们作出拯救的奉献并唤起对尽善尽美的追求。正如著名的文化史学家克里斯托弗·道森 (Christopher Dawson, 1889—1970) 所揭示的: 基督教“宗教理想并不是一种超越时间的、没有变化的完美崇拜, 而是一种奋力使自身融入人性并改变世界的精神”。^① 牛津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牛津基督教史(插图本)》(约翰·麦克曼勒斯主编) 一书 (下称《牛津基督教史》), 同样自始至终地反映着这种基督教永久的变化性及其焕发出的令人惊异的生命力。

《牛津基督教史》无论从其涉及的内容还是就其篇幅而言, 都堪称一部巨著。它在“从起源到 1800 年”、“1800 年以后的基督教”和“基督教的今天和明天”三个层次上描述了基督教近两千年的发展历程。它所运用的许多鲜为人知的素材以及从中概括出的新思想, 可以使我们对基督教历史演变的了解, 进入到对人类精神和潜意识的深刻领悟中去。

—

基督教从起源到 1800 年的历史, 在两端分别经历了一次相对短暂的转折时期, 一端是具有神秘性的迅速发展时期, 另一端是具有决定性的剧烈改革时期。《牛津基督教史》的第一个部分最为突出的, 就是阐明了这两个时期在基督教发展史上的意义。

早期基督教的神奇性发展似乎建筑在一系列传奇和神迹的基础之上, 虽然到它被确立为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只经历了短短的四个世纪, 其间还曾多次遭受迫

^① 克里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Western Culture*), 长川某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7 月第 1 版, 第 6 页。

害，但是《牛津基督教史》一书开始几章的作者们不仅肯定了“基督教似乎是在一种人们无所察觉的状况中迅疾发展起来”的事实，同时也揭示出它的创立者和救世主是一个实际的历史人物，并且阐明这种新宗教迅速发展的原因，在于这样一个神学主题：“上帝在尘世的统治及其对教会的眷顾。”这一主题的最具魅力之处在于它同人类进步和完善之间所达成的必然联系。同时，基督教神人合一的崇拜对象，使之具有比同时代其他神灵崇拜更突出的优越性和现实性，即那个“惟一的、无限的、哲学上可敬的上帝，他通过具有领袖气质的、可爱的悲剧人物耶稣而得到崇拜”。^①

《牛津基督教史》对早期中世纪欧洲的描述牢牢抓住了这一时代的传教特点。在“皈依的时代”，基督教文明的发展和传播直接依赖于伟大的传教士及其支持者。这是基督教历史的第一次关键性转折。一方面它是由古老文明中心向未开化民族和地区的转移，另一方面它表明基督教文明完全可以摆脱罗马帝国衰落的影响。这样，基督教文明作为一种具有领先性的思想精神，对世俗社会的影响将更为深刻。同西方轰轰烈烈的传教不同，《牛津基督教史》把以拜占庭为中心的东方基督教世界描绘成如此情景：注重内心灵修的修道院生活和臻于精致的神学教义。在那里，拜占庭把基督教和世俗统治紧紧结合于一体，从而造就了一种人间如同天国的神圣秩序。这与西欧相比截然不同。在西欧，除了加洛林王朝曾一度建立神权君主政体以外，其主要历史的一般过程始终是在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的二元体制轨道上运行的。对此，道森的结论可以用来概括我们从《牛津基督教史》中了解到的事实：“这种文化领导与政治权力之间的相互独立性，是产生西方文化的自由而充满活力的活动的主要因素之一。”^②

《牛津基督教史》向我们展示的中世纪成熟的基督教文明是辉煌和丰富多彩的。神权的确立和稳固、修道院生活的发展、通俗布道对平信徒的吸引、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对社会的广泛影响、教会职责的崇高无上、经院主义神学的发展等等，作为中世纪基督教文明的成就，这一切使人们感到目不暇接，也使我们了解到这一时期并不像某些粗浅的史学记载的那样阴暗。但是，《牛津基督教史》的作者同样尖锐地指出了这个辉煌时代中诸如十字军东征及其失败、异端裁判所这样一些灰色之处。对此，《牛津基督教史》的作者之一科林·莫里斯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异端裁判所“标志着从昔日的宽松自由的信仰形态，发展到一种对人产生压抑的教会政体和制度”。基督教文明在达到高峰的时刻，也就开始了它的衰落。一个新的转折来临了。

转折似乎就在13世纪下半叶开始，《牛津基督教史》用了较长的篇幅来描述近四个世纪的变革，其中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基督教的扩张被当作基督教发展承前启后的关键而得到了重点突出。关于宗教改革，《牛津基督教史》实际上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观点：宗教改革不只是马丁·路德个人的事业，而是广大信徒扬弃

① C. 沃伦·霍利斯特：《西方传统的根源》（*Roots of Western Tradition*） 鲁品越、许苏明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第197页。

② 克里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 长川某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11页。

传统、腐朽的宗教并追求新的灵性抚慰的必然产物。路德新教突出的是“福音”，宣传的是现世行为的神圣性，超凡的神学已转变成现实的神学。因而当启蒙运动来临时，这种变化为新的社会形态提供了新的神授恩典。所以，变革时代的基督教既是新思想、新观念的母体，又是初生儿；它既是痛苦的，又是幸运的。新教伦理以“上帝即爱”和“蒙恩得救”的教义突破了“原罪意识”的桎梏，从而使人们对宗教信仰的理解和取舍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正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所说的那样：对宗教行为的理解，“只能从主体的经验、观念和个人关切的目标的着眼点——简而言之，从宗教行为者的意图的着眼点去获得”。^①最终，思想的发展将结出现实的果实。基督教孜孜以求的普世主义，将在18世纪的殖民高潮中得以“实现”。《牛津基督教史》的作者之一约翰·麦克曼勒斯指出，基督教要真正成为“普世性宗教”，“就不能再把它仅仅局限于欧洲文明之中”。当然，《牛津基督教史》也使我们看到了普世传教是何步殖民者的后尘，甚至是踏着血迹走向世界的。

二

1800年以后的基督教不仅是世界性的，而且是变化不定的。无论是适应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时代变迁，还是适应于世界性传教的要求；无论是作为宗主教凌驾于被殖民者之上的精神统治，还是适时地与各种古老文明相融合，形成各具特色的基督教。总之，它面临更广泛的挑战，同时也得到更深刻的发展。这一切，正是《牛津基督教史》第二部分为我们描述的宗教现实。

《牛津基督教史》充分肯定的一点就是这一宗教的自我应变能力，而这一点在基督教的欧洲表现得更为突出。欧洲社会是基督教的中心，但也是反基督教的先锋。当封建主义急剧转向资本主义的时刻，人们就必然起而推翻旧制度的精神支柱，继而为新时代寻找和设计另一种精神寄托。值得庆幸的是，基督教的自我变化意识使之不能在一场社会大变革中扮演消极被动的角色，其教义曾引人注目地由“君权神授”转为“天赋人权”，甚至成为反封建革命高涨的旗帜。同时，基督教也开始走出自我设置的牢笼，面向纷繁的世界，并不断作出适时的调整。这就是在新思想、新观念纷繁叠出的欧洲近代文明中，基督教始终占有稳固地位的原因所在。

与此同时，《牛津基督教史》也深刻地指出，这种宗教传入世界各大洲的基础，除了人们易于理解、比较明显的殖民主义和经济扩张的原因外，它还根植于基督教文明执着的传教使命感之中。北美大陆的基督教发展正是因此呈现出一种即使在欧洲也少见的繁荣景致。《牛津基督教史》基本上把北美宗教描绘成普世主义的一个成功范例。涌向新大陆的欧洲移民带去了各自的宗教，在恶劣的境况里，宗

^①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Guenthey Roth and Claus Wittich 合编) Bedmister 出版社，纽约，1968年，第399页。

教所解决的不单纯是精神问题，而且也是凝聚力量谋取生存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教派之间的关系既是竞争的，又是并行的；教义上既是纷繁多样的，又是一致协调的。在这种辩证统一之中，《牛津基督教史》阐明了“美国精神”和“美国气质的宗教”的根源所在。它进而指出：新大陆北美的宗教特征是它以明显的世俗化为表现形式，但具有广泛和牢固的宗教基础。北美的宗教从一开始就属于民众，属于世俗生活的一个部分，并且推动了诸多世俗事件的发展。或许，这正反映了现代宗教的一个发展方向。与北美宗教差异明显的拉美宗教从根本上是因为它来自于伊比利亚天主教王国，因此显示出明显的保守性。然而这终究也无法阻挡拉美独立教会支持和鼓舞独立运动的兴起，它带给人们反抗宗主国压迫的思想武器和精神力量。此后，拉美宗教经历了一个从伊比利亚式宗教向独具自我特色的拉美宗教的演进过程，印加文化的古老光彩为基督教注入了新内容。这样，拉美宗教就不单是社会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也会对解决社会问题有所助益。《牛津基督教史》几乎在传教所达的范围内都找到了这种宗主教向独立教会发展，从而摆脱传教士和欧洲控制的趋势，这确实印证了书中提出的“基督教中心南移”和“基督教多样化”的观点。

非洲和亚洲的基督教发展一方面同样符合上述宗教独立的趋势，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这两个地区未能实现基督教化的原因所在。前者有着至今尚未完全摆脱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影响，因此非洲基督教由独立意识转变为“抗议性质”的倾向最为明显。使本书作者也感到惊讶的是，非洲曾经孕育过基督教最古老的教会，但它的悠久历史几乎被白人殖民者开创的“文明历史”所取代。传教士对非洲教会的控制致使“白人优越”的意识至今仍作祟于非洲大陆。因此，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像非洲那样迫切需要形成独立的基督教会。而在亚洲，基督教受到了同自己一样具有顽强生命力并且丰富多彩的古老文明的抵抗，两者之间又几乎没有形成相互共融的可能。基督教一方面是借助“坚船利炮”进入东方古老文明的土地的，因而必然招致民众的抗拒心理，最终也导致了这样一种其他地区所没有的状况，即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反基督教的倾向。另一方面，亚洲人接受基督教的目的又是很现实和功利的，大部分信仰基督教的人着眼于这一宗教信仰与西方物质文明之间的关系，试图通过引进这种精神力量来改变自己极弱的国势。应该说，《牛津基督教史》对于这种矛盾心理的揭示是切中事实的。

总之，1800年以后基督教的发展趋势正如本书主编约翰·麦克曼勒斯所指出的：“尽管基督教逐渐分化，但仍富有生命力；它既不受制于某一个国家，也不为哪一个国家所厚爱；它既无须受命于罗马，也不要欧洲监督。”这不仅在1800年以后，而且在今天，并可能预计在将来都会得到明证。

三

基督教的今天和明天面临着似乎是无穷无尽的挑战和威胁，同时也承担着更为神圣和繁重的拯救义务。人们以更为超然的态度对待宗教信仰，同时也将更为

投入地依赖于宗教信仰。《牛津基督教史》一书的最后部分并不因为充分反映了这种挑战性而使人们对这一宗教感到绝望，也并不因为基督教依然具有吸引力和现实作用而使人们对此盲目乐观。它的确客观地反映了基督教赖以生存并发挥作用的希望之所在——永久的可变性。

首先，基督教教义将不再是固定不变的。宗教信仰的自由选择决定了对信仰内容的自由理解，从而带来了对教义以及教义解说的不同取舍。但是，对于物质渐趋丰富而精神日益贫乏的现代人来说，基督的作用又是现实的和无可拒绝的。他既论证了上帝对尘世的认同，又表达了上帝对尘世的拯救；他既是对人的精神的安慰，又使人类不感到孤立无援。进一步讲，新教伦理几乎从根本上使人们摆脱了对“原罪”的恐惧，并为人们找到了现世行为的神圣基因。基督的受难和复活的新意义在于使人们懂得，只有行动才能克服罪恶。这无疑成了马克斯·韦伯论点的又一个注脚，韦伯指出：“加尔文教徒通过他日常事务中的成功找到了对被罚入地狱的恐惧的解脱。在市场上成功，在生意圈内活跃，便似乎是受到上帝宠爱的最确凿的证据。”^①最后，对于“天堂”的向往，将使之成为基督教中最少受到诘难的神学预设，因为它将作为一个参照物，从本质上体现基督教精神对改善人类生存状况的关注。

基督教团体在今天面临的挑战同样是严峻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宗教统治早已成为历史遗迹，它失去了对整个社会事务的仲裁权。在思想上，新知识日渐丰富，占据了人们头脑中对宗教的幻想。全社会已不再热衷于支持宗教事业，教会也不单纯是精神机构，而逐步带有社会机构的性质。体制化的教会将更加依赖现代手段和大众传播工具实现其拯救和医治的目的。因为基督教所追求的乃是普世的救赎，乃是充当人类的卫道士，乃是体现对上帝所造的一切的眷顾，因此，教会仍将以自身的努力顽强地生存下去，并对社会施加自身的影响。

然而基督徒面临的问题似乎简单明了，他们现在更少受到过去教义纷争之类的影响。但现代社会中科技发展、战争、核武器、伦理道德、医学和生物学问题、环境和自然灾害，以及堕胎、性自由、个性解放等问题，都将会不可避免地困扰着每一个基督徒。基督徒的良知在世俗诱惑面前最严峻的抉择就是是否对这个不健全的社会继续尽职行善。就此一点，马克斯·韦伯早就有了明断：“无论善事作为一种获得拯救的手段是何等无用……但它们作为被上帝选中的标志，却是不可缺少的。它不是赢得拯救的特有手段，而是摆脱惩罚之恐惧的特有手段。”^②因此，今天的基督徒显然不会泯灭这种反映着人类忧患意识的良知。

《牛津基督教史》最后一章“基督教的未来”的作者约翰·泰勒指出：“基督教历史的过去和将来都是对历史事件的一系列反映的产物。”这充分印证了“宗教是历史的钥匙”的论断。关键在于，这把“钥匙”将开启一个什么样的未来。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未来世界中，每个人将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也许基督徒拥有某

^① 转引自《马克斯·韦伯》，弗兰克·帕金著，刘东、谢维和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第61页。

^②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Allen and Unwin，伦敦，1930年版，第115页。

种精神力量，但也因此承担着比任何时代的基督徒更艰难的拯救义务，背负着更沉重的精神包袱。但是，《牛津基督教史》的作者提出并肯定了这样一种思想：在作为一个基督徒已失去了任何优越感的今天和明天，拯救这个世界毕竟是神圣的。

最后还有两点可以强调，一是针对《牛津基督教史》一书贯穿始终的精神实质而言，那就是它认为要预计宗教的消亡时日是十分愚蠢幼稚的；另一是针对该书的创作观而言，可以引用主编约翰·麦克曼勒斯的话来表达：“编史工作如今已是一门摆脱了基督教成见的学科，而昔日它在从基督教中汲取养分的同时，却又受制于它。”应该说，《牛津基督教史》一书充分如实地反映了这两个内容。但是，由于该书的作者们并不具备坚实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基础，因此他们并不能完全恰当地把宗教发展放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历史长河的正确位置上去考察；在他们努力摆脱宗教立场束缚的时刻，终究难以摆脱西方史观的局限；在他们对许多问题作出精辟公允的论断时，又往往对另一些问题轻率下结论或作出扭曲的理解。就此而言，它对全书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译者（沙辰执笔）

1995年3月

Original published in English under the title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Oxford is a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目 录

I 《牛津基督教史》中译本序(丁光训)

I 译者序

1 导论(约翰·麦克曼勒斯)

从起源到 1800 年

- 23 第一章 早期基督教群体(亨利·查德韦克)
- 60 第二章 从罗马到蛮族人的诸基督教王国(330—700)(罗伯特·马库斯)
- 84 第三章 西方:皈依的时代(700—1050)(亨利·迈尔—哈廷)
- 109 第四章 东方基督教世界(凯里斯托司·韦尔)
- 141 第五章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杰里米·约翰斯)
- 168 第六章 基督教文明(1050—1400)(科林·莫里斯)
- 200 第七章 中世纪晚期的教会及其改革(1400—1600)(帕特里克·柯林森)
- 226 第八章 世俗的启蒙运动和基督教的启蒙运动(1600—1800)
(约翰·麦克曼勒斯)
- 252 第九章 基督教的扩张(1500—1800)(约翰·麦克曼勒斯)

1800 年以后的基督教

- 283 第十章 大不列颠与欧洲(欧文·查德威克)
- 318 第十一章 北美(马丁·马蒂)
- 350 第十二章 拉丁美洲(弗雷德里克·派克)
- 378 第十三章 非洲(彼得·欣奇利夫)
- 403 第十四章 亚洲(肯尼思·鲍尔哈切特 海伦·鲍尔哈切特)
- 427 第十五章 东欧东正教会(塞盖·哈克尔)

基督教的今天和明天

451	第十六章	基督徒信仰什么(莫里斯·怀尔士)
467	第十七章	基督教团体的新形象(布赖恩·威尔逊)
491	第十八章	基督徒的良知(巴兹尔·米切尔)
511	第十九章	基督教的未来(约翰·泰勒)
541	参考书目	
569	大事年表	
595	索引	
675	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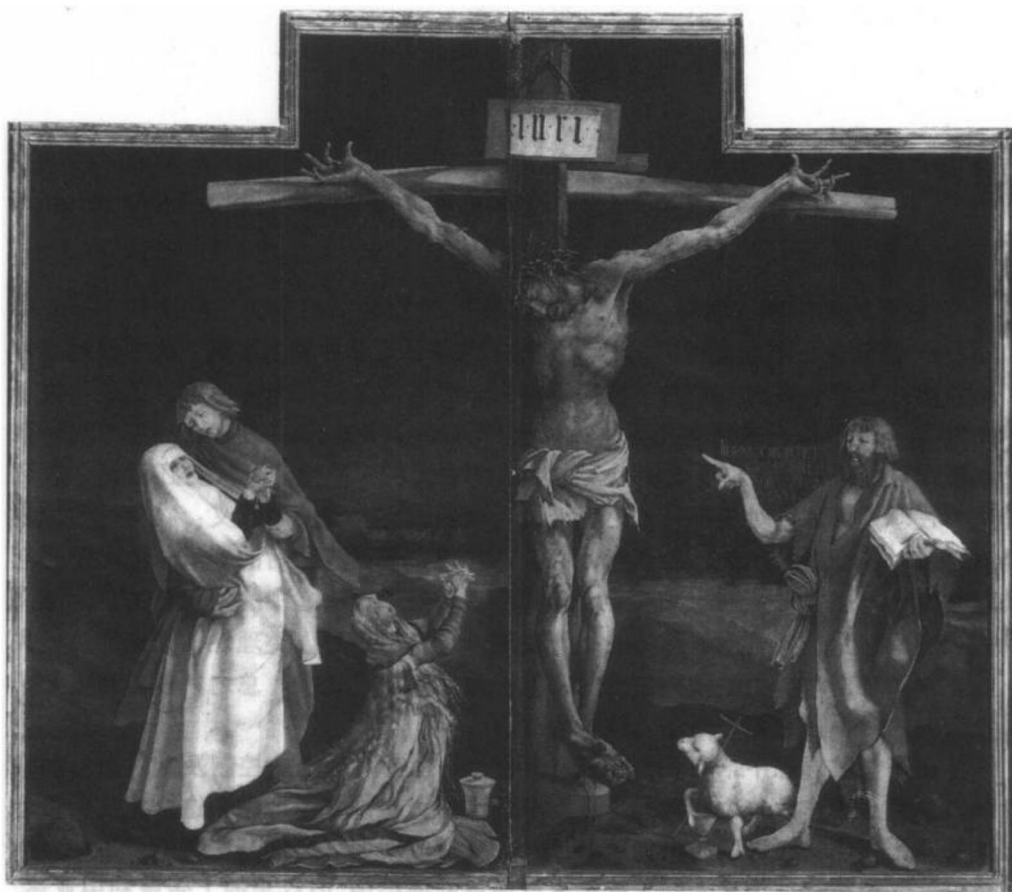
导 论

约翰·麦克曼勒斯 (John McManners)

“耶稣，拿撒勒人耶稣。我记不起他来了。”退位后的本丢·彼拉多 (Pontius Pilate) 谈起他在耶路撒冷时的往昔时说了这番话。拿撒勒人耶稣，这个曾行过神迹并被钉上十字架的人的名字被提了出来，可彼拉多对此毫无印象。上述传说于1891年圣诞节那天被阿纳托里·法朗士^① (Anatole France) 发表在一家专与神职人员作对的报刊上，它不仅使教会中虔敬的女士们深感惶恐不安，还激怒了教区里的牧师。可是，对于不可知论者来说，该传说有着双关的意义：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前，基督教的火种已经点燃，而且，它将在帝国灭亡后的若干个世纪中燃起熊熊烈火，但罗马帝国的文人学士和统治者对处于襁褓之中的基督教的重大意义从未有所察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朗士后来出于对人类理性和预见能力的失望，却又对当时极力主张神佑论的宗教护教家作出了让步。总之，基督教击败了它所有的对手，它是一部令人惊叹的故事。

在基督教思想中，其不断重复的主题乃是上帝对历史的控制及其对教会的眷顾，这常常被作为一个护教的论点而得到引用。在许多场合中，这个笼统的概念被具体化，反映在神职人员为了保证初次证道成功而编造的某些神迹奇事中，或其对信徒将被接纳为义人的千禧年末世场景的描绘中。旧约里的上帝曾利用亚述、埃及等许多世俗强权以表明其旨意，他又被基督教所接受。在奥古斯丁 (Augustine) 看来，罗马逐渐强大的原因在于它为“上帝之城”奠定了基础，而非像西塞罗所认为的那样，在于公义之治。上帝君临尘世的观点贯穿于中世纪所有的编年史籍之中，并最终在波舒哀 (Bossuet) 的《世界通史》 (*Universal History*, 1681) 里得到了集中反映，它闪烁着巴洛克时代的熠熠光彩。该书是波舒哀为新登基的法国国王编写的。他在书中写道：“请记住，阁下，上帝深奥难测的眷顾旨意，乃是造成历代王朝兴衰存亡的各种特殊原因。上帝从至高处驾驭着尘世间的诸王朝，芸芸众生都操在他的手中。”尽管这话是对世俗君主的告诫，但它显然包含着一个更为深邃的主题，即：历代王朝终究难免分崩离析、毁于一旦，惟独宗教永固长存、经久不衰。由于人类不断进步永无止境的观念当时业已为欧洲人所适应，基督徒和世俗人文主义者对此采取了接受的态度，尽管他们对所谓上帝拥有限制人类自由和制约自然法则的“保留权力”还颇多疑问。由此，人类的进步与上帝的眷顾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这位为了宏扬上帝而大唱赞歌的维多利亚时

^① 法朗士 (1844—1924) 法国小说家。——译注



耶稣受难 画家格品内瓦尔之作。作者凭借其其对光线与色彩的高超处理技艺来表现画中人物的丰富宗教情感。这里他运用赤裸裸的自然主义，并以那一时代忧郁、神秘的虔敬精神来描绘基督的受难。

代的编年史家认为，上帝在“年复一年”地实现他的旨意，直到“上帝的荣耀遍布大地，如滔滔大水溢满四海”。

然而，基督教认为，上帝在历史过程中进行操纵，既不意味着仅仅凭借其无所不能的庇护，世人就可以如愿以偿地获得成就——宣传上的说法另当别论，也不意味着世人有能力了解上帝超然的眷顾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进行——尽管诸多公开宣扬之词恰好与此说相反。教会把自己视为上帝的选民，这显然是承接了犹太教的衣钵。可在旧约里，身为选民的犹太人却每每受到上帝的教诲性惩罚和粗暴的弃绝。如同上帝在旋风和黑暗中向约伯和三位预言家发出的责备所启示的那样，上帝的运行方式对于世人乃是神秘而不可预测的。下述两位伟大的先哲在中世纪基督教思想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他们不赞同把上帝对教会的引导与世俗的成就或进步相提并论。奥古斯丁认为，各个历史时代与永恒之间都保持着同等距离，“上帝之城”属于神的救赎范畴，故它高居于普通的世俗历史之上；在波